



北国风

岁月同馨

远去的麦海

□赵富

从二十四节气来看,在二伏尾三伏头的当间儿(中间),就到小麦收割的季节了。

我的家乡这块儿,已经很久不种植小麦了。在广阔的田野里,片片碧绿苍苍的苞米叶子,把原来滚滚麦浪覆盖在记忆深处,却始终淹没不掉心中那遥远的麦香。每当麦收季节,家乡远去的麦海,仿佛又从遥远的天际波涛汹涌地滚到眼前。

生产队年代,小麦是家乡的主要农作物之一。每个小队有三分之一 的种植面积。小麦连成大片,一眼望不到边沿。在小麦刚出苗时,她像一张天大的绿毯,铺在平坦的土地上;一到麦茎拔节时,她忽然脾气大涨,变成大浪滔天的绿色海洋,撑起小小的村庄和广阔的田野;待到麦穗揽黄时,她又忽然满脸灿烂,由碧波滚滚的青春气息切换成金光万道的喜人肤色,瞬间出落为锋芒毕露的成熟少女。

种小麦是有严格节气要求的。农谚说:小麦种在冰上,收到火上。老话也说了几百代:清明种麦。农谚还说:三月清明麦在前,二月清明麦在后。这些农民的智慧结晶,诠释了种地与节气的规律,从而定格一条自然法则:清明前后是种小麦的最佳时机。

记得播种小麦时,地里的雪一疙瘩一块的还没有化尽,屯子里大坑边沿上的水,一早一晚还会结层冰茬儿。大地里白天化了的两指厚土,晚上又恢复冻上一层。而麦籽播在化土层里,上边盖层化着的水,下边却枕着很厚的冻土。这就是小麦种在冰上的情形。

我出生在五十年代初期,记忆中模模糊糊地还有种大垡麦子的印象。当时农村还没有实行机械化大片播种小麦,还处在大垡播种小麦的原始文明耕种阶段。人工点种,犁杖扣垡,苗眼儿很窄,产量很低。其播种方式,与种谷子、高粱很相似。

记得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家乡开始推广小麦平播技术。公社有了拖拉机站,有几台洛阳制造的东方红链轨拖拉机,屯里人简称其叫“链轨车”。各大队轮流播小麦,一个小队也就一天两晌便完活了。队上头年秋天把地翻完整平耙细,一到麦播季节便不耽搁啥事。“链轨车”牵引着播种机来回跑着,而驾驶员则像对宝贝似的,每个小队吃好喝恭敬着。

时光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刚出学校门回乡劳动,在春天种小麦的时候,队长分工让我跟车看播种机。跟“链轨车”播种,对于我来说,是件很新奇的事。这是我第一次跟车播小麦,便体会到了其中的无穷乐趣。当时早晨天气还有点冷,得穿个薄棉袄;到了太阳光充足的时候,遍野地气升腾起来,连天接地。红色“东方红”拖拉机,在乳白色的地气中来回奔跑着,那情景似仙境般让人陶醉。

“链轨车”牵引着大播种机,在油黑的大地上呼呼地来回奔跑。

庄稼地里,小麦算是好侍弄的庄稼。没等草长出来,小麦便封苗眼了。不用灌溉,不用除草,不用铲趟。小苗长出一哪高时,用镇压器压一遍。目的是让麦苗根扎得扎实,省得起啥把根裸露出来。这个时候,由于麦苗还没长茎,只是几片叶子,待压完后,第二天早晨露水一打,小苗便又支棱起来,一点也不损坏小苗的身体。

二伏尾三伏头,是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们闷得喘不过气来。麦收时节正逢雨季,小麦收割时间性又强,过两天麦穗就会弯勾,一碰便掉下穗,所以又叫“抢收”。

麦收季节,又是农活最忙的时节之一。庄稼地一年有两个“收获季节”,最忙是秋收,也叫大秋,时间在秋天;其次是麦收,仅次于大秋,时间在伏天。麦收,全体社员都要参战“抢收”,连积肥员都得上阵。

夕阳西下,晚霞挂在西边。社员们拿着刀,围着毛巾,小衫上的汗渍一圈套一圈儿的。走道都快不起来了,腿脚很乏,迈着很沉重。屯里的炊烟划着圈儿冒着,在喊主人回家吃饭。老远望去,还很有诗意的。

早些年时,打麦子是用碌子打,与打谷子一样。一马一碌,一连串十几副。翻场剥草,一天也轱辘不出多少麦子。后来用“小丰收”打麦子,用“链轨车”带设备;再后来,用电机代替“链轨车”,更方便快捷了。黑天白天一起打,几天功夫就打完小麦了。

家乡的小麦,只种了不几年,便逐渐减少了,最后干脆就不种了。原因是小麦产量低,亩产一百多斤;而大苞米产量高,亩产一千多斤。时间一晃,小麦离开我们视野30多年了。一个种植品种的淡出,印证着一个传统观念的更新。小麦退出了家乡的田野,这是当地种植结构的改进,也折射出农村发展变化的印迹。



扫码关注
北国风副刊

本专栏由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与本报合办



哈尔滨:新中国协商民主的重要起点

□张戈



部分民主人士在哈尔滨合影。一排左起李立三、谭平山、沈钧儒、李德全、蔡廷锴;二排左二为朱学范、左三为章伯钧。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同时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其后,毛泽东曾就政治协商“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5月5日,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中国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及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士)等联名致电毛泽东,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同时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外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8月1日,毛泽东致电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者、参加者的范围、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广泛征求意见。

当时,哈尔滨在中共东北局的领导下,开展了建立新政权、改造旧城市、恢复和发展经济、土地改革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已经初步建成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生活改善的战略大后方。在毛泽东的提议下,经与多方协商,中共中央初步决定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筹备会议拟选址在哈尔滨召开。

在新政协的筹备过程中,河北平山县李家庄(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距西柏坡5华里)和哈尔滨是解放区接待民主人士的主要地点。全国各党派民主人士历尽艰辛,从四面八方相继汇聚于两地。由于当时香港与解放区之间的陆上、空中交通均已中断,中央最初试图开辟的“香港—英国—苏联—哈尔滨”路线,没有得到英当局同

意。之后,又开辟了从香港乘船到大连或营口,再北上直接进入解放区的海上通道。

经过中共中央周密安排,首批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陆续抵达哈尔滨。

朱学范(曾任民革中央主席),于1948年2月28日由伦敦经苏联到达哈尔滨,参加了先期在哈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址为今哈尔滨儿童电影院)。该会议恢复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也成为新政协筹备会的组成单位。

沈钧儒(曾任民盟中央主席)、谭平山(曾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章伯钧(曾任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蔡廷锴(曾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等人,乘坐苏联货船,于1948年9月13日上午由香港出发,经过16天的海上航行辗转到达哈尔滨市,入住马迭尔宾馆。

王绍鏊(曾任民进中央副主席),于1948年9月17日离港北上,辗转多地,于10月初抵达哈尔滨,入住马迭尔宾馆。

李德全(冯玉祥夫人),于1948年11月2日,携冯玉祥将军骨灰经苏联抵哈,入住马迭尔宾馆。

之后,相继辗转到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还有李济深、何香凝、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茅盾、章乃器、彭泽民、陈其尤、沙千里、邓初民、柳亚子、马寅初等四十余人。在哈尔滨期间,他们同先期抵达的沈钧儒等人一起,游览参观了哈尔滨市容,瞻仰了东北烈士纪念馆。

1948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将经中央统战部与部分抵达河北平山县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充分商讨形成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电发中共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李富春,请他们就新政协诸问题与在哈民主人士商榷。

1948年10月21日、23日,11月15日,高岗、李富春、张闻天、林枫等中共中央代表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等在马迭尔宾馆会议室举行了多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

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交换了意见。

11月初,沈钧儒、谭平山等人在讨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时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商谈,取得完全一致。

11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李德全在马迭尔宾馆会议室举行会议,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协议决定了新政协筹备会的参加者和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同时把新政协的筹备会会址预定为哈尔滨。这份文件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得到批准,这是筹备新政协活动

沐河之河

□孙戈

凉棚回头望,见我在,就继续干活。

去山里采蘑菇、榛子、哪柿(野生蓝莓)自然不会带我。一是路太远,再是怕山里有狼有蛇,那是我难得和小伙伴一起疯的时段。

去河边囤鱼,奶奶会带上我,岸上铺一块布,就是我的“自留地”。奶奶便把她背来的鱼囤、罐子、口袋等放下来,开始囤鱼前的准备工作。

鱼囤是一种自制的渔具,扁圆桶状。桦树皮围成了四周和底座,上面是密网,中间有圆口,在圆口边抹上自己做的鱼饵,撒到河里。鱼就会因为贪食,游进囤里出不来了。

每隔一段时间就起鱼囤,把囤里的鱼倒在罐子里,再在圆口边抹上鱼饵,又撒到河里。等待的时间,奶奶就坐在我旁边,给我讲现编的故事。罐子里的鱼多了起来,各种各样,我不认识。奶奶就指着鱼告诉我,这是柳根儿,这是麦穗儿、这是葫芦籽、这是鲫鱼子……鱼在罐子里游动,我又分不清了。

也是傍晚,太阳还没有完全落山,我俩满载而归。奶奶会把最小的鱼放到一个小罐头瓶子里,线绳绑紧瓶嘴,让我拎着。

沐河村依山傍水,靠山靠水终究不会受穷,加上土地肥沃,风调雨顺,日子过得始终不错。

河水冰封的时节,便有人去山里捕猎。孢子、野猪、野兔、野鸡都算不上稀罕的东西,一家猎得,左邻右舍都会跟着沾光。奶奶会做这些野味,狗子肉烤着特别好吃,野猪肉做法很多,可以剁馅包饺子,可炒可炖。野兔可以红烧,野鸡剁成小块,热油爆炒,在锅里“啪啪”响,再扔里两个晒干的红辣椒,特别焦脆。

村子里没有市场,只有一个供销社,供应一些日常用品和农具,买东西的人似乎也不多,除非家里少了食盐、酱油、醋、老白干、花生米啥的。常有闲人在供销社转悠,打发无聊的时间,售货员也无事,柜台上就摆着一副象棋,围在一起下,争执不休。偶尔也有人推着车进村卖冰棍、糖葫芦、捏糖人,走街串巷地吆喝,就有女人领着孩子出来,没有现钱,用鸡蛋换。

最快乐的时候是部队农场放露天电影。男女老少拿着小板凳,揣着榛子、瓜子,步行三五里的路程,像赶集一样。屏幕上多是《英雄儿女》《地道战》《地雷战》。

电影散场时大家倾泻而出涌上公路,有人拿着手电筒,更多的人对这条马路再熟悉不过了,即便闭上眼睛也能摸回家里。三三两两,说说笑笑,孩子们穿插其中,蹦蹦跳跳。远远望去,山体安静,河水幽幽,只有山水之间的路上

古籍郎中 修补岁月的斑驳残片

□那可



古籍修复师张丹玫。

本报记者 张澍摄

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大量古籍由宣纸印刷,宣纸以其易于保存,经久不脆,不会褪色特点,享有“纸寿千年”的美誉。

明代收藏家周嘉胄在《装潢志》中写道“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讲述古籍修复师应具备的本领,要让古籍真正达到“纸寿千年”,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修复师这一双双补天之手的不断接力。

对于一个古籍修复师来说,无论现实的世界夏去冬来、阴晴冷暖如何变换,一旦坐到修复古籍的台前,拿起嵌满文字的斑驳残片,外界的时间和空间似乎立即就退后了。

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师张丹玫说:“提起古籍人们脑海中经常产生往事越千年的辽阔联想,其实在现实中由于保存条件等因素限制,不少清代留存的书,到如今已是‘危重病人’。而古籍修复师,正是给古书治病‘郎中’。”张丹玫拿起一张书页,泛黄的纸张历经酸化、虫蛀,纤维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将它毁坏,而这书的状

况在待修复古籍中还不算最差的,随后她又拿起一本已经修复好的古籍,筋骨健壮厚实、翻阅起来激荡清风阵阵,整齐的线装,古朴的样式,让人忍不住想用手摩挲一番,这是古籍修复完成的样式。

书是有生命的,线装书作为古籍中最普遍的装订形式,于清代最为风行,它的各部名称分为:卷首、天头、地脚、中部、卷尾、书口、书背、书脑、书角等等……其中很多称呼是按照人体部位来命名的,显示出古人对书籍的珍视和书本身蕴含的内在生命力。

张丹玫介绍,给古籍问诊,就像给人看病开方治病,但更准确地说像应用了现代医学技术的综合治疗。首先,所有古籍都要建立档案,做一次全面“体检”。建档过程中书籍大小、颜色、纸张乃至出库日期都要详细记录,拍摄照片。对于书的全面“体检”,包含测PH值、检查每处破损位置、破损原因等,细至微处仅破损一项还需详分为虫蛀、鼠啃、霉蚀、浆糊失效、水浸、油浸、撕裂、磨损等原因,被多次修复的古籍还拥有“治疗档案”。古籍郎中,一方面要练就火眼

金睛断“病因”,另一方面要开动脑筋定“治疗方案”,依照方案准备好材料后,才能进入人们熟悉的修复环节。

修复的第一步通常是清洗,当洗书水由混变清,再用干宣纸小心地将古籍中的水分吸干,古籍就可以上“手术台”了,修复师要为它们的伤口选用材质、颜色匹配的纸张。尽管修复中心毛、皮、麻、竹及混料纸和各类各色宣纸超百种。选纸过程中还是会遇到颜色不匹配的情况,这时就要用水、墨、胶和涂料调配适当浓度的溶液对纸张进行染色,然后再比对,如果颜色不同还要重新染。为求“神似”,修复师甚至还会尝试将纸泡在各种茶水中,再晾干比对待泛黄的颜色是否一致。

修复古籍通常需要20多道工序:拆书、揭书页、书叶去污、配纸、溜书口、补书页、托书页、修书皮、压平、折叶、裁齐、墩齐、锤平等等等……不胜繁琐,但最好的方案一定是选用工序最少的。“拆书相当于给病人动手术,无论怎样都伤元气。所以,古籍修复有‘整旧如旧’‘最少干预’‘可逆性’‘抢救为主、治病为辅’四大原则。”

的第一份正式文件,也是多党合作制产生的第一份重要文件。

鉴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的缘故”(周恩来),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均已成熟”,“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

作为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诸多筹备工作的最初开展地点,哈尔滨见证了新中国多党合作第一份重要文件的诞生,可以说是新中国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起点。

欢声笑语,人流缓缓而动。

后来我回到县城读书,寒暑假常回沐河村,可以跟着奶奶去山里采榛子,可以去河边打冰爬犁,最喜欢的还是能去部队农场看一场露天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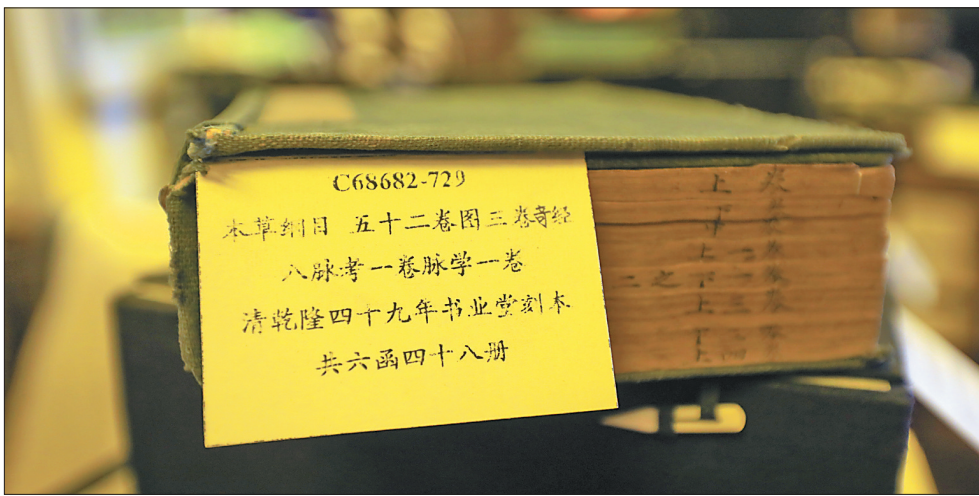
那年五叔也回来休假,他已经是海軍军官了,一身戎装十分英武。我羡慕他那双走起路来“咔嚓”响的皮鞋,就央求他借给我,穿在脚上走去部队农场,又从部队农场走回,惹来很多人回头,羡慕地看着我。

还给五叔时,他拎起来,把头扭向一边,说,明天和我去河边,把鞋里好好刷刷!

常有女人在河边洗刷,多是被面褥单。其实家家都有轱辘把井,有洗衣盆,出来也为扯扯家常。女人们一边拿着棒槌敲敲打打,一边说着话,不一会儿河岸上就晾上了五颜六色的单子。

五叔肯和我一起玩了,一路上我翘着脚,老叔就拍着我的肩膀说,还用急?过不了几年你就撵上我了。

我俩找个僻静的地方,他把衣服脱下,跳到河里游泳。他水性好,一股脑游到对岸,健硕的身体在岸上走。我则套上他的军装,模仿着向他敬了个军礼。他就在那边笑,爽朗的笑声穿透过来,久久回荡。



省图书馆古籍库中的古籍。

本报记者 张澍摄

张丹玫说,如果修补方案不正确,就会对古籍造成二次破坏。此外就像病人看病极少换主治医师,因为每个修复师的思路和手法不同,古籍修复也是一本书由一位“郎中”负责到底。为每一本修复过的古籍留下“治疗档案”,也是希望有朝一日后人再修复时有所借鉴。

古籍修复是一项很难定量的工作,一次有朋友拜访张丹玫,她手头正在修复一本清朝的佛经,一年后当朋友再次拜访时,发现她手边的依然是这本佛经。张丹玫说,我当然不是一整天都在修这一本书,只因为该书破损严重,此前还被收藏者私下用纸壳粘过,除胶除痕耗费了大量时间,只能一边干别的活,一边修这本书。古籍修复又是一场与时光复杂交错的持久战,修复师一方面尽力不让古籍消失在时光长河中,另一方面又要让古书最大限度保存时光流淌过的痕迹。

我们今天的努力可能终究还是会败给时间,但正是一代代人对时间顽强的抵抗,让我们的文化流传了下来,这是从事古籍修复师这一行业最深的体会。